

〈研究ノート〉

## 浅析清季走向世界的中国留学生群体 及其知识背景

吴 鲁 锋

**摘要：**晚清以降，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迫使当权者改变对外认识与对外政策，派遣留学成为可能。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留美，拉开清季官派留学运动的序幕。此后又于80年代先后选派80多名青年赴欧洲各国学习军事、制造等技艺，官派留欧登上历史舞台。甲午战败，清政府将留学目光转向日本，1896年选派13人赴日，成为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到1906年前后十余年间，留日生达两万余人，形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留日高潮。清末几年，影响深远的庚款留美兴起，近200名青年赴美留学。加之几十年间以其他各种途径负笈海外的求学者，清季的海外留学生群体多达数万人，蔚为壮观。

**关键词：**晚清时期；留学生；中文知识

### 一、教会资助的留学生群体

19世纪中期的留学活动大多发生在民间，这一现象的出现多半是受到了来华传教士的影响。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学校，是中国学生接触西学的窗口。教会学校的老师们具有西方特色的授课方式和内容，开拓了中国学生的视野。与西学的接触也成为了中国学生出国学习新知的动力。此

外，传教组织或传教士个人的资金资助，也为中国学生出洋留学提供了资金支持。正是这种带有“宗教色彩、零星分散、偶然性极强的民间留学，培育出有异于传统的新力量，从而最终成就了政府行为的大规模官派留学生。”<sup>1</sup>此外，面对西方国家的入侵，古老的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的近代化潮流之中。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善，逐渐扭转了国内开明士人的“夷夏”观念，出洋留学备受推崇。鉴于早期民间留学生较为分散，本文只选取其中的几个典型例证进行说明。

在以教会、传教士资助为主的早期自发性留学生中，容闳、黄胜、黄宽是不可绕过的重要代表。1847年，容闳、黄胜、黄宽在美国传教士布朗（Rev. S. R. Brown）的帮助下前往美国留学，因此他们也被称之为“近代留学生中的先驱者”。容闳（1828-1912年）广东香山南屏村人，因其家境贫寒童年未曾受过系统的私塾教育。1835年，容闳来到澳门，进入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小学学习，开始接受西式教育。虽然容闳在中途辍学，但他已能“诵习《圣经》及《天路历程》二书”<sup>2</sup>。1841年，容闳进入在澳门的马礼逊学校。长期在充满西方基督教文化氛围的校园中学习，容闳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和倾慕与日俱增。1845年9月，马礼逊学校为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也为争取各方资金支持，举行了一次公开考试，并选取6篇英文作文刊登于《中国丛报》。其中的《一次幻想之旅》一文，描述了学生对于“新大陆”的诸多幻想。作者全凭想象，不仅盛赞了纽约“天堂般的生活”，表达了对西方世界的热切向往，还将“知识”视为“幸福和快乐的源泉”、“驱除一个国家无知迷雾的亮光”<sup>3</sup>，上述观点均与当时国内学界的固有认识相悖。当时的国人还未真正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只是一味逃避与西方社会的接触，固守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尚未认识到变法图强以自立的必要性。同时，传统的儒家文化仍然是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基，士人、官僚依旧以科

---

1 李喜所编，刘集林著：《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2 容闳著，恽铁樵、徐凤石译：《容闳自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 顾长声著：《从玛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99页。

举为上升的门径。像容闳这样率先接触西学的中国少年，在当时被视作社会的异类，不为清政府和民间社会所接受。容闳们的“幻想之旅”，是一次艰难而又新奇的求学旅行。虽然容闳少年时便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但他仍然坚持用毛笔书写正楷中文的习惯。容闳于1854年大学毕业之际写给同学的赠言即是笔画工整、字体端正的正楷毛笔字，这一事实从侧面反映出容闳的中文学养。<sup>4</sup>容闳自幼赴美留学在美国又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其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均刻上了深深的西方印迹。但是，容闳的中国文化背景也对他的成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容闳从小与哥哥一同研习中国传统文化，背诵“四书”、“五经”、古典诗词、《古文观止》等经典。以致于容闳日后不仅能用毛笔书写汉字、创作律诗，还能将“四书”、“五经”活学活用于毕业赠言之中<sup>5</sup>。

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颜惠庆的父亲颜永京早年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并进入美国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所办学堂学习，并且于1854年得到教会资助赴美留学。1861年，颜永京毕业于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自1868年开始，在教会任职并参与文华学堂和圣约翰书院的创建工作。颜永京对颜惠庆兄弟二人的学习教育格外严厉，颜惠庆早年曾就读于上海一个秀才创办的私塾，“跟着这位启蒙教师，开始学习国学的入门知识”，“私塾的教学方法是老式的，我们必须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孝经》等，此外，每天都要练习书法”。<sup>6</sup>传统蒙童读物成为颜惠庆兄弟早年国学知识的重要来源。后来，颜氏兄弟先后就读于英国教会创办的中英学堂，以及由英国人创办的同文书院。青少年时期，颜惠庆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武侠小说以及传奇故事，颜惠庆记述：“青少年时，凡是能找到的中国小说，我们都读了”。在颜惠庆出国的前一年，颜永京为他聘请了一位秀才当老师专门学习国学经典为出国学习做准备。颜惠庆

4 陈汉才著：《容闳评传》，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5 章开沅著：《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耶鲁馆藏档案简介》，《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6 颜惠庆著，吴建雍译：《颜惠庆自传——以为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页。

“每天用六个小时，攻读古籍，练习写文章和书法”，他的老师“孜孜不倦地教我作八股文、写‘试帖诗，以考取功名’”。<sup>7</sup>颜惠庆打下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尽管出生、成长于已经半西化了的上海，我们对本民族的文化 and 人文环境仍然情有独钟”。<sup>8</sup>1895年，颜惠庆在其父亲颜永京的安排下，入弗吉尼亚圣公会中学（The Episcopal High School），后入弗吉尼亚大学（Virginia University）。

其他如顾维钧等自费留学生，早年也都接受了系统的学堂教育。顾维钧对其早年教育经历也有记述：“当我三岁零一个月的时候，二哥和我就被送去上学。是一位朱先生开办的私塾”<sup>9</sup>，年龄渐长后，顾维钧跟随姐夫一块入读基督教卫理公会开办的英华书院，学习英文、中文、地理等科目。后又转入一位留日生开办的家馆，学习中文、历史、书法、作文、算术、地理、英文和体育等课程。<sup>10</sup>1901年前后，他入上海圣约翰书院学习。该院“聘请了新教师多人以取代守旧的教师”，“我们的中文课改由一位留日归国的学者讲授，他完全同意康梁维新派所主张的新思想”，“他不要求我们阅读和背诵经书，而是按不同题材，有的根据经书中的引文，有的根据时事，进行讲课。这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sup>11</sup>

同样受教会及传教士资助的早期女留学生还有金雅妹、柯金英、石美玉、康爱德等。近代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金雅妹（1864-1934年），又名金韵梅，浙江鄞县韩岭人，父亲金定元（译音）是宁波耶稣教长老会的牧师，与1844年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麦加缔博士（Dr. D. B. Mccartee）交

---

7 颜惠庆著，吴建雍译：《颜惠庆自传——以为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页。

8 颜惠庆著，吴建雍译：《颜惠庆自传——以为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页。

9 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10 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页。

11 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9页。

情甚笃。金雅妹2岁多时父母相继去世成为孤儿,由在宁波的美国传教士麦加缔夫妇收养为义女。1881年,在传教士麦加缔的资助下,17岁的金雅妹进入著名的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学院。1885年5月,她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最早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女留学生。据《纽约时报》报道,女子医学院5月29日举办的第17届毕业典礼上,医学院院长罗伯特·海多克(Robert Haydock)为11位毕业生颁发了毕业证书,而在这11位毕业生中,金雅妹是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报道称中国及日本驻美使馆官员出席了典礼。<sup>12</sup>毕业后,金雅妹先后在纽约、佛罗里达和华盛顿的一些医院实习,由于金雅妹理论知识扎实,临床医术甚佳,对刚刚兴起的显微医学研究有特殊心得,很快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887年,她的学术报告《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在《纽约医学杂志》上刊出,引起医界同行的重视,并于1888年获医生资格。金雅妹先后在我国华北、日本和夏威夷从事医生工作10年。其间曾返回美国,金雅妹居留美国期间,其与美国社会交往广泛,并频繁进行了有关中国文化、中国困境及中日关系等主题演讲。

1859年,孤儿曹子实被美国传教士蓝伯斯夫妇收养,在其资助下赴美国学习;1878年,宋嘉树随宋姓堂舅赴美国波士顿,起初在丝茶店当学徒,于1881年,进入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学到范德堡大学神学院。1882年入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神学院,1885年毕业。1901年,直隶通州的美教会学校潞河学院,资送孔祥熙、费起鹤两名优秀毕业生赴美留学。

综上所述,该留学生群体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他们多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居住地社会风气较之内陆更为开放,并且自幼接触中国传统教育,有一定的中文学养;其二,该群体所原生家庭多与外国教会存在联系,或早期即进入教会学校学习,接触西学校较早。

---

12 LITTLE ORIENTAL LADY WHO WON PEACE CONGRES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1904.

## 二、官派留美幼童群体

容闳之所以被称为“留学教育之父”主要是其在推动中国官派留学生的进程中发挥了开创性作用。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时便产生了“留学教育救国”计划，即选派优秀的中国青年前往美国留学，致力于以西方的科学技术改造中国，使古老落后的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然而，当容闳返回祖国实施其计划时，却遭遇到重重困难，经过18年的艰辛努力，于1872年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支持，决定4年派120名幼童，由容闳带领前往美国留学。在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留美幼童的中国文化背景可能会存有疑问。因为幼童出国时年龄尚小，其中国传统文化水平仍有待提高。所以幼童在留美期间，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下文将从留美幼童的选拔、预备出国以及留学生活三方面，对留美幼童的受教育背景进行考察。

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其二人的联名会奏中列出了《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从《章程》条例中可以看出留美幼童的挑选是相当严格的，《章程》规定“(幼童)应选条件为年龄十三至二十岁，曾读中国书数年，……姿性聪慧，并稍通中国文理者”<sup>13</sup>（奕訢将幼童年龄过定位12至16岁）。1872年2月17日，容闳在留学计划得到批准后致信诺亚·波特教授<sup>14</sup>，介绍了幼童选拔的情况，“入学资格包括：资质聪慧、体格健壮、个性纯正、品德优良、年龄在10至20岁之间。入学前，10至15岁者需学习一些指定的经典作品，15至20岁者则需具备以中文标准格式写作之能力。幼童在预备学校学习英文与中文，每日时间平均安排。”<sup>15</sup>其实，在实际进行的考察中并不仅只看重中文基础，《章程》还规定“出洋的学生不仅要聪明，长相也要

---

1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14 诺亚·波特(Noah Porter, 1811-1892)，美国教育家，1871-1889年任耶鲁大学校长。

15 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端正,因为代表大清国出洋,不可有碍观瞻。”<sup>16</sup>甚至挑选学生中有名字不雅驯者、粗鄙者,也要责令父兄亲属先期改正。正是基于清政府“严苛”的选拔条件,加上在上海预科学校一年的学习,虽然他们出国的年龄偏小,但是其自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再加上在留学生随员中配备两名中文教习,出洋肄业局规定在美幼童寒暑假要学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幼童以三个月一次来局习华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为满。逾期,则此十二人复归,在换十二人来。以次轮流,周而复始。每日卯时起身,亥时就寝。”其学习内容包括“读书、写字、讲解、作论,皆为一定课程。”<sup>17</sup>在《留美幼童的奖励学习办法与作文》中要求:“作文习字、国文的基础训练”,“关于作文有论与解二种。高级生作论,低级生作解。……籍以训练学生读经作文。”<sup>18</sup>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使得这批留学幼童开始了夹杂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留学生活,留美幼童的中文学习即使在美国期间也未曾中断。

1872年9月,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航程,第一批幼童终于在旧金山登岸。9月15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题为《清国留学生抵达旧金山》的消息:“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清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曾到过美国访问过的清国人都好看得多。有3名身为清国官员的教师陪着他们。”<sup>19</sup>美国民众对这些幼童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为了使得这些幼童在生活和学习上得到更好的条件,容闳与美国友人商议将幼童分别寄养在医生、教师、律师等知识分子家庭中,每个家庭安排2-4人不等。美国政府对这批留学幼童给予了很大的关心。1872年7月12日,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P.Low)在给美国国务卿费

---

16 钱钢、胡幼草著:《大清留美幼童记》,香港: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页。

17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64页。

18 《留美幼童的奖励学习办法与作文》,转引自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19 《纽约时报》,1872年8月15日。转引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斯 (Hamilton Fish) 的电报中提到：“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幼童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遣派我们的军舰来此更佳。”<sup>20</sup>1877年，李圭在其《环游地球新录》一文中记述：“尝观其寓西人绅士家，颇得群居切磋之乐，彼此若水乳交融，则必较相有成。是中西幼童，皆受其益也。况吾华幼童，仍兼读中国书，而不参溷。使其专心致力，无此得彼失之虞，是其法之良善者也。他年期满学成，体用兼备，翊赞国家，宏图丕烈，斯不负圣朝作人之盛意也欤。”<sup>21</sup>所以，在中国留美幼童到达美国之前，美国家庭已经做好了接待幼童的准备，在幼童到达时给予了友善、真诚的接待。这种家庭寄养式的生活不仅使得幼童们切身的体会美国家庭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展现在了美国民众面前。

### 三、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留欧生群体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清政府面对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境遇下发动的自救、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由洋务派开办的留学教育事业，也多直接或间接与强军御侮相联系。清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酝酿以学习军事技术为主要目的官费留欧活动，在“变易兵制、讲求军实领其纲”，“以海防引其端”<sup>22</sup>的主导思路下，晚清的留欧教育以学习欧美军事技术为目的，并形成了海军为主，兼及陆军的留学派遣格局。

1876年4月15日，李鸿章挑选淮军将领卞长胜、查连标等7人，随同德国教官李励协 (Lchmeyer) 赴德国学习军事，这是清政府官派陆军留学生的开端。1877年，鉴于当时容闳挑选的留美幼童知识基础薄弱，其在国外学习时间较长，因此主张海军留学生应派遣年龄稍长，且具备一定外语水

---

20 高宗鲁著：《中国幼童留美史》，台北：华欣文化事业出版中心1982年版，第33页。

21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64页。

22 《复陈葆航侍郎》(1864年9月11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音，第34页。



平和科学的知识基础。留学年限初定为3年。据此,李鸿章与沈葆楨在福州船政学堂挑选刘步蟾、林泰曾等30人,在李凤苞、日意格,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等人的带领下赴法国学习海军。之后在李鸿章、沈葆楨的主持下,分别于1881年和1886年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选取10人、34人留学欧洲,学习军事技术。1889年,李鸿章借德国教习瑞乃尔(Schnell Theodore. H)归国之际,奏报清廷选取段祺瑞、商德全、吴鼎元等5人随瑞乃尔赴德国学习军事。

随着官派留学的开展,清政府对留欧学生的留学年限做了比较恰当的规定,为此后的留学教育,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例。留欧学生的留学期限并不完全统一,一般是2至3年,最长不超过6年,比起留美幼童长达15年之久的留学期限,这一期限显然更为省时省钱。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在规定时间内收效最大,缓解国内人才匮乏的窘境,清政府还对留欧生的年龄、专业素质做了严格的限定。首先,和留美幼童不同,留欧学生大多都是20岁左右的成年人,具有较为成熟的生活、学习能力。其次,该时期的留欧生基本精通接收国语言文字,如不能精通者则不予或缓予出国,可见清政府对留学生的语言要求非常严格。一般来说,船政留欧生在派往欧洲之前,至少已受过5年以上的堂课学习和外语训练,对于此段求学生活所掌握的技能,船政学堂学生曾有这样的描述:“我们的老师 Carrol 先生掌握了这些原则,来自远方,宏宣教化,讲授天文、地理、算学等科,胜任愉快,未曾使任何东西落后,而经常奋力工作。”<sup>23</sup>从该段文字可以看出,留欧学生出国前已经学习了较为系统的专业知识,并且这些专业知识多为西人直接教授。这样的教育前提,使留欧生具备更高的学习起点。当时船政学堂事务的主管官员指出,“续派生徒出洋就学,原期就已成之绪,资深造之功,自必通晓泰西语言文字方能悉心讨论”,……“于制造、驾驶之学虽有根底,惟于泰西语言文字尚未精通”,故暂时“无堪派之人”,提出要对学生“勤加训课”,三四个月

---

23 《田凫号航行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

后达到要求再“挑选保送”<sup>24</sup>。最后，还需经过各地主办洋务大臣严格考察、精心挑选，留欧生选送条件之严，本着宁缺毋滥原则，由此可见一斑。

官派留欧学生在当时不仅达到了清政府预期培养军事人才的效果，而且该时期的留学生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随留欧生赴法的职员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祿也分别进入英、法各国学校学习。马建忠入巴黎政治学院学习法律、政治、交涉等专业；陈季同入巴黎政治学院学习交涉、律例等；罗丰祿进入伦敦士官学院学习物理、化学、气象等。

#### 四、清末新政时期的留日生群体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面临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出洋留学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1898年，张之洞在其《劝学篇》“游学第二”中写到：“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尝见古之游历者矣。”<sup>25</sup>这种对于留学海外优势的言论，在清政府开明的官僚阶层得到广泛的认可，张之洞又提出：“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入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sup>26</sup>随后几年，清政府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鼓励留学政策，例如：准奏张之洞等人上呈《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颁布《广派游学谕》、《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等，大力提倡和支持自费留学，“令有财力之文武各大员及各省富商，各选聪颖子弟，

---

24 《光绪五年十一月八日闽浙总督何璟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25 张之洞：《劝学篇》，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6 张之洞：《劝学篇》，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自备资斧报名，由各省资送总理衙门，一体汇送外洋学堂肄业”。<sup>27</sup>并且规定自费出国“不必限以年岁……”。1901年，光绪皇帝在上谕中表示“如有自备旅资出洋游学者，著各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励。”<sup>28</sup>在此大环境下，中国赴日本留学者络绎不绝，一度成为潮流。日本学者曾对此情景有过描写：“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sup>29</sup>

该时期在留日生群体中，虽然仍然以男性留学生为主导，但是此时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女子留学日本也成了新风尚。女留学生即便数量较少，但其作为留学生出现在日本，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在日本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女留学生受中国留学风气的影响，其成分也是参差不齐，除部分女子是孤身赴日留学，其他多为随夫、随父母、随兄同行。至于早期留日女学生的学习情况整体水平仍处于较低层次。不少女子出国前并未进过正规学堂进行系统地学习，所识汉字有限，数学、理化等科目接触极少，外语基础更是相当薄弱。但这并不妨碍她们远渡重洋，赴日留学。日方为了满足中国女留学生的需要，在一些女子学校专为中国学生开设速成班。这些速成班既有两年制的“本科”，也有半年制的“专修科”。中国留日女学生虽然整体基础较差，但经过刻苦努力，从她们中间仍涌现出一批活跃在日本社会的佼佼者。据《女子世界》1905年驻日本东京调查员称：“中国女子在东京者百人许，而其中最著名者共30人，就中长于英文者有吴弱男女士及陈撷芬女士一流；长于汉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长于数学、几何、代数学者有陈光

---

27 《刑候补郎中京霍翔呈》(1898年9月11日)，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28 《清帝多派学生分赴欧美游学谕》(1905年9月1日)，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29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璇女士、黄振坤女士一流；长于音乐者有潘英女士一流。”<sup>30</sup>1907年以后，中国留日教育开始由速成教育向正规教育过渡，学制延长为至3年。当时中国女子留学多往日本，学习师范、家政、工艺等专业。早期的中国女留学生曾给日本社会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评价中国女留学生们“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畏，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能及。留学生中，有其夫婿在东京留学者，会晤之际，其应对之仪，周旋之情，实称平等。昔闻，中国尊男卑女，以今观之，殊为不然。男子对女子如此股勤郑重，岂以奴隶待女子耶。”<sup>31</sup>日本教育家下田歌子对女留学生也有评价，她说：“今之来者于学程皆能自奋，无假督率，已为可喜，且贵国风俗以女子之畏见男子者为守礼节，而来此游学者，初犹畏怯，渐亦更改，竟能悦大方，行止自由，论学讲学，一如男子，此尤其可敬者，可见贵国女子性格高尚，本非有逊于男人，而特无教育以养成之遂至与国家毫无关系，实为可惜也。”<sup>32</sup>这充分说明在封建礼教重压下的中国妇女，一旦接触新事物，接触新思想，学习新学问便会发挥出她们的智慧和才干。中国女学生并不比外国学生差，她们在接受了适当的教育后，甚至比日本妇女更有进取气象。当时就是驻日留学生监督也对留日女学生大加赞赏，“下田歌子学校中，女学生数十，于专门学科俱见成效，志趣高尚者，颇不乏人”<sup>33</sup>。这些女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界的出现，向日本社会展现了新的面孔，中国女性不再是以一种男人的附庸存在的形象。她们大多缠过足，并在中国封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环境下长期生活，而留学日本使她们打破了传统理念的束缚，并向日本社会展现出了中国女性新的面貌，“小脚蹒跚闯世界”是早期留学女子的生动写照。晚清时期，中国留日女学生由1903年的十几个，经过几年发展其数量维持在100人左右，1907年139名，1908年126名，1909年149名，1910年125名，1911年为81

---

30 (日本)东京调查员：《外国特别调查》，《女子世界》，第2年，第3期。

31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页。

32 《支那留学生——女子气质》，《游学译编》第一期，第12-13页。

33 《咨商女学》，《新民丛报》第26号，《记事》，第3页。

名。<sup>34</sup>

据统计,先后有超过两万的中国学生东渡日本,形成了第一次留日热潮。这种留学潮流导致晚清留日生群体成分复杂,胡汉民在其自传中记述:“其时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此类以学自然科学者为多),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此类以学社会科学者为多),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其原来之资格年龄,亦甚参差。有年已四五十以上者,有才六七岁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米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来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法政学校更有为新进士所设之特班,殆如散馆之入翰林院,功令使然)。”<sup>35</sup>这一庞大的留学生群体其知识背景也是参差不齐,但是从该时期留日学生所组建的社会团体、创办的宣传刊物,译介的中日文书籍以及在各种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情况来看,大部分留日生具备良好的学识,即使有些留日生因语言或课程不能满足入学条件,便选择日本所开设的预备学校,学习语言和补习相关知识。留日生黄尊三在其《三十年日记 留学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其到达日本前期进入当时到日本的留学生,一般从基础知识学起,并先后进入巢鸭宏文学院和正则英语学校补习。这是专为中国留学生补习而设,注重日语与普通学科学习<sup>36</sup>。综合考察,晚清时期留日学生不仅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贡献了重要力量,而且对清末时期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 五、再跨大西洋:20世纪初的留美教育

继留美幼童之后,官派留美学生以1900年南洋公学派遣2名学生赴美,

---

34 留日女生数字统计参见:谢长法:《清末的留日女学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5 《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第4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3页。

36 参见黄尊三著:《留学日记》,长沙:湖南印书馆1933年版,第5-11页。

为“20世纪初公派留美的先锋。”<sup>37</sup>1906年，清政府规定，留学生“凡欲入高等以上学校及各专门学校者，必有中学堂以上毕业之程度，且通习彼国语文，方为及格”。<sup>38</sup>1906年和1907年北洋大学堂共计派遣留学美国者44人。1908年6月，美国国会同意将庚子赔款多余部分退还中国，作为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基金。1909年9月，清政府开始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派遣留美学生。对于使用退款的实施办法，美国代表与清政府外务部经过数次会谈，商定从1909年起，最初4年每年派遣留美学生100名，从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50名，直到退款用完为止。早在交涉退款阶段，清政府就开始策划有关招生和考选事项。1909年7月10日，在《遣派游美学生规程》的基础上，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拟定了《遣派游美学生大纲》，内容涉及：设立游美学务处；设立游美肄业馆；考选学生的标准和方法；津贴在美留学自费生的办法；专设驻美留学监督等内容。1909年7月29日，外务部和学部通电各省督抚，当年只取第一格学生遣派美国留学，定于9月4日在京考试。考试科目为“一、经义；二、中国历史；三、中国地理；四、英文词章、论说；五、古今历史；六、浅近德文或法文并能与英文当面互译；七、算学，高等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三角；八、初级物理。如报考专门科学者，其中学、英文及古今文字，俱照以上程度。惟史学只须英兼美或希腊或罗马，算学加对数、物理、化学均须有二、三年程度”。截至1909年9月2日，在游美学务处报到的有603名考生，多数是北京学生。9月4日考试国文，5日考试英文，8日张榜，按分数录取68名。这些初榜录取生在9日复试考试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10日考试立体几何、物理、美史、英史，11日考试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13日发榜，正式录取的第一批留美学生为47名，其录取比例不到8%，此数远远没有达到本年应派遣100名的计划数，这充分说明清政府对于考选工作是严格认真

---

37 李喜所主编，刘集林等著：《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页。

38 《学部奏咨辑要》卷1，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的,更多的是看重留学生本身的知识积累。1909年10月,在唐国安的率领下,首批留美学生乘“中国”号轮船由上海启程,11月13日抵达华盛顿。当时美国各大学的学期已经临近结束,唐国安和容揆商议决定依学生的程度分别进行安置,较优者直接送入大学学习,其次者先行补习后再入大学学习。第二年,所有学生分别进入美国各正规大学学习。第一批留美学生中的多数人选择了理、农、工、商、医、矿等科,与派遣大纲中的要求大体相符。

1910年3月,学部根据派遣游美学生的新情况制订了《考取学生与考送游美学生办法》,该规章更完善、规范。对考选的第二批留美学生,游美学务处做了认真缜密的准备,广布考选办法,鼓励报考,考试仍分两次进行:7月21日首场考试国文、英文;7月25日,将第一场录取各生张榜公布,从400余人中录取272人;7月26日考试高等代数、平面几何、希腊史、罗马史、德文、法文;7月27日考试物理学、动植物学、生理学、平面三角、化学;7月29日考试立体几何、英史、美史、地理学、拉丁文。这次考试科目比前次考试增加了动植物学、生理学和地理学,从考试科目足以看出对庚款留美学生的知识储备的考察是极为全面的,要求考生具有广泛的知识面。8月2日,最终选取70人,录取比例不到18%。1911年,游美学务处按照经费数目,从清华学堂高等科学生中选取了第三批留美学生63人。从1909年到1911年,三批选拔出的留美中国学生共计180人。同时该时期的自费留美生数量也不断增加,据粗略统计从1890-1908年,约126人。<sup>39</sup>

通过严格地考核与遴选,该时期留美生的知识背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具备良好的中外知识储备。这一时期留美生在国内多接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大都毕业于中国新式学堂或教会学校。1904年《美洲留学报告》曾指出:“今留美诸君在大学者,自土生外,大都从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上海约翰书院来者,他几无所闻。”<sup>40</sup>中国传统儒学、新式科学和外文等都具备一定基础,多数所选拔的留学生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学习。另外,在选取方面全部都是通过严格的国内会考选拔出来的,从其考试内容来看初试为国

39 吕光斌:《近代自费留美生研究》,南开大学硕士论文,第53页。

40 《美洲留学小史》,《学报汇编》1900年,第583-586页。



文和英文；复试考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立体几何、物理、美史、英史、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等科目。“能被录取者，皆具有良好的中西文化涵养”。另外，考察前三批留美录取人数与美国所要求的“每年100人”的计划，人数尚未达到，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方面是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的，严格筛选，生源优良。

二、年龄上看，该时期留美生年龄段在16-20岁，已为成年人，有独立的生活和学习能力。与早期留美幼童相比，不仅在心智上更为成熟，而且出国前的知识素养更是不可相提并论。即使与同时期留日速成生及留欧军事生相比，其所具备的中国文化的内涵也同样具有优势。进而在留学国的环境中，面对美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歧视及误解，其传播中国文化的力量及影响力也更大，更具主动性。

## 结 语

晚清时期中国留学生群体出国前接受的良好教育，为其打下了扎实的传统基础，这为他们后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如前文所述，即使是中国留美幼童在出国前及留学过程中也进行了中国系统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学习。其他群体的留学生的早年教育既有西学知识的学习，也有国学的基础训练，其教授的内容极为丰富，这些内容新旧夹杂，亦旧亦新，带有过渡时代的特色。新式知识汹涌而来，传统知识依旧具有生命力。在留学生身上，传统与现代尚未完全割裂，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们以后的学术旨趣和思想走向。他们在之后对比中西文化时，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既不会刻意抬高西方文化，也不会过分贬低中国传统文化。